

第八辑

文学与文化

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与文化》编委会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文学与文化

第八辑

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与文化》编委会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文化. 第 8 辑 / 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与文化》编委会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6
ISBN 978-7-310-02942-6

I . 文… II . 南… III . 文史哲—中国—丛刊 IV . 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1092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4 插页 279 千字

定价：4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目 录

【古代文学思想研究】

- 3 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话语 张 穆
17 清初词坛的诗词之辨 孙克强
29 梅曾亮文学思想考辨 柳春蕊

【现代文学研究】

- 43 “洋场习气”、“新党”、“志士”的讥讽者
——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和政与道的脱纽 耿传明
55 “义民”神话的破灭
——晚清中国“义民”书写嬗变初论 林 晨
67 悖论与焦虑：简说新文学中的“文体互渗” 罗振亚
73 20世纪中国话剧发展中的现代性问题 李 扬

【文化视角】

- 87 俄苏红色经典中的弥赛亚原型引用 王志耕
97 互文性与文类 李玉平
107 情感哲学研究的美学意义 杨 岚
125 班固对《诗经》“本义”的探求 张立克
132 从宋元明清各代宫词之序跋看其时的宫词观念 胡 静
140 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新闻价值观 刘 畅
151 “我”与“人们”
——试谈《祝福》叙述者的文化建构 任慧群
159 乌托邦之迷与思
——论当代女性书写中的姐妹情谊 王 宁



- 166 赛珍珠的战争观和女性意识在《龙子》中的体现 徐清
179 中国小说对日本江户时代文学的影响 (日)庄公孝

【文学个案】

- 189 金元之际杨奂的诗文成就及影响 查洪德
199 质朴中得风神:归有光散文风格论 刘尊举
208 “小说如文”: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文体认同 周志强
222 一种未完成叙事状态的魅力
——试析《扶桑》叙事中的第二人称 翟杨莉
230 哈代小说的狂欢化表达
——从人物设置看哈代小说的狂欢精神 滕爱云
237 探析《百种秘密感觉》中的神秘化叙事与爱的主题
..... 于秀娟

【文学文献考论】

- 247 翼奉《诗》学著述存留考 张峰屹
257 《霞笺记》与《西楼记》考论 陶慕宁
262 古代济公小说叙录 宁稼雨
267 二晏片考 唐红卫
273 “关羽战蚩尤”故事的演变 颜建真
283 清代女作家林以宁考 康维娜
294 2005年版《鲁迅全集》编校刍议 刘运峰



古代文学思想研究





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话语

张 毅

“现代性”是可以作多种阐释的开放性的文化理论，运用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涉及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文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等多方面的内容。其社会世俗现代性与文艺审美现代性的矛盾，构成了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内在张力，为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的“解构”和“祛魅”留下了伏笔。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除了以乌托邦式的浪漫审美理想批判由启蒙理性主导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制度弊端外，还要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反思“现代性”的各个方面，包括文艺现代性的语言和形式，以及审美现代性的美感经验等。有关“后现代”的话语，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传入了中国，比“现代性”概念的出现还要早，但当时的反响并不大，直到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多年高速发展而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才显著了起来。注重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面对文学生成方式的商业运作、文学消费的大众化与时尚化，以及图像文本和网络文学的兴盛，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除了坚持追求人生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伟大传统外，似乎还可以从后经典叙事学和后结构主义的“互文”话语里获得解决问题的另类思路。

—

作为对现代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审视和反思，“现代性”理论的蕴含十分丰富，它既是一种含有内在张力和矛盾的关于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同时也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文化态度，一种尊重个性自由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这种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涉及社会文化现代性、文艺审美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等多方面内容，提供了从整体上观察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宏大叙事。



有人曾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社会启蒙思想发生的标志，可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其上溯到晚清，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启蒙主义在西方是社会现代性的旗帜，主要体现为强调理性至上、尊重人权和主张社会变革，为工业文明鸣锣开道，而中国的现代性思潮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主题，形成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据说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前都有一个想象过程，而晚清文学里就有大量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当时的小说里专门有“爱国小说”一个类别，通俗的白话文学在晚清也已成气候。这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认同，著名的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要以民主共和的宪政代替王权主义。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新中国”，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这不仅是现代中国要解决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也是支持中国现代文学宏大叙事的一种基本的想象。从“五四”时期胡适提出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30 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及 40 年代有关文学“民族形式”的讨论，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意识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成为现代中国作家塑造国家形象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原动力。^①对“新中国”的想象，作为一种社会现代性的中国经验，是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时的悲壮感情相互激荡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里，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叙事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当中华民族从昏睡中醒来时，似乎每个人都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工业化为基础，与此相伴的是一个城市化过程，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公共空间，如工场、商店、舞厅、酒吧等，完全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节奏，构成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文学的兴起，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关于上海“摩登”(modern)都市生活的想象和体验，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活动、传播方式都有深刻的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上海在 20 世纪前半期

^①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转型与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载《文艺评论》2003 年第 1 期。



曾是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和现代气息最浓郁的都市，许多著名作家都喜欢生活在那，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文学论争和艺术尝试也发源于那。^①上海的魅力就是城市的魅力。城市文学具有娱乐消费性质，并形成一套依靠报刊等现代印刷传媒的商业运行的文学制度，这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就已经表现得十分典型。当时的上海文学，除了用于启蒙的社会政治小说外，大量的以娱乐消遣为主的通俗故事，流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本地或寓居上海的作家多为靠写作谋生的文化人，他们的作品要通过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传播，于是形成了各种以同人刊物为核心的创作风格相近的文学社团。作家作为自由职业者，其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出版市场的消费需求。

这种具“海派”文化性质的文学制度，虽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为国家的政治权力话语所排斥，但却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文学的自然生态，因此在 20 世纪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以后，特别是全民皆商的 90 年代以来，它又以势不可挡的姿态现身文化市场。“现代性”是追求合理化的社会发展逻辑，它既表示不断进步的时间观念，也蕴含着特定空间场所的生存体验，如城市里的商店招徕顾客的广告词：“逛一逛也是享受。”作为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生活体验和审美创作，20 世纪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性是不容置疑的。

现代性的“现代”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时间的尺度，落实在社会进步上；再一层是价值的尺度，指文化发展的现代性。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是三位一体的，即科学精神、民主政治和艺术自由。依康德之说，人类文化分为科学、文艺、道德三大领域，科学求真，文艺求美，道德求善，真、善、美是文化价值的基本范畴，也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国“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革命意义，在于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以个性自由和“人”的解放为目标，要与传统专制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彻底决裂。自“五四”以后，中国作家的求真意识体现为在创作中强调“写实”，信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为文学要反映历史的真实，要为现实负责，主张在

^① 李欧梵等：《现代性的中国面孔》，载《文艺理论研究》2003 年第 6 期；王安忆：《城市与小说》，载《文学评论》2006 年第 5 期；杨剑龙：《论上海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2006 年第 6 期。



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体现科学精神,采用科学方法。^①其对民主的追求融入革命的话语,即民主革命,重点在革命,而革命又要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由现代政党政治衍生出来的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作家的党派倾向很明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不乏党同伐异的权力话语之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二是把“人民性”作为评判作品的重要标准,以工农兵文学和人民文学为发展方向。谁能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谁就站在了民主和道德的制高点——让人民当家作主和为人民服务。

人民民主其实只是一种形式,本质是追求人的自由,而美是自由的象征,道德实践也只有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才是真正的善行。“五四”新文化的价值,还可以从提倡“个性自由”或“人的解放”的角度来认识,这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更具决定意义。郁达夫就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他认为“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就是“个性的表现”。^② 这是非常到位的认识。文学是人学,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是传统中国人转化为现代中国人的根本标志,也是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性文学发生的根据。当时流行这样一首翻译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它激动过许多革命青年的心。“五四”新文学的文化现代性主要体现为:把由西方传来的以个人独立为核心的“自由”奉为最高的人生价值,肯定个人的存在意义和尊严,主张个性自由,追求人的解放,使文学成为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的文学”。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说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时代语境,那么文艺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则决定了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特质,构成文学批评现代性自身的特殊话语。

作为自由表达精神的体现,现代主义文艺在题材上追求新奇、怪异和反常,在语言或形式上进行各种实验,试图颠覆传统的叙事

^① 王铁仙:《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程金成等:《中国现代文学价值选择的启示》,载《文学评论》2006 年第 6 期;张毅:《“赛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② 郁达夫:《艺文私见》,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5、206 页。



方法。文艺领域的现代主义，强调艺术的自主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对抗工具理性在社会整合过程中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个性的压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波特莱尔《恶之花》的翻译、李金发的印象主义诗歌、施蛰存等人的新感觉派作品，以及后来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先锋派诗歌和小说等，被公认为具有追求形式创新和自由表达的现代主义特点。这些具先锋性质的文艺创作，或用辞藻的色彩和声调的节奏造成较强的感观印象，或以刺激性的形象、晦涩的语言和神秘的象征调动人们的狂热情绪，或以“前卫”的姿势和高峰体验拒绝平庸。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鲁迅而言，近年也有研究者认为他不仅是有清醒理性的启蒙主义者，也是信奉自由思想并用文学表达自由的伟大作家，他的散文诗、小说和杂文等，在语言的创新和文体形式的独特等方面都具有先锋性。^①或者说，作为现代文学经典的鲁迅作品，其形式的丰富多彩满足了自由表达个性的需要，其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则是理性自身的叛逆，是一种文学家的感性生命对现实合理化制度的绝望和反抗，而这正是文艺现代性的体现。

二

文艺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矛盾，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在张力，于是有两种现代性之说，即社会的世俗现代性与文艺的审美现代性。原因在于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理性至上与个性自由两种思想维度：一方面是对启蒙的追求，对进步的信仰，对工具理性的倚重；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要舒张人的感性需求和想象力，用文艺的审美方式摆脱物质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社会体制对思想的禁锢。

说到文艺现代性，语言等艺术形式的创新无疑是重要的，因具体可感的艺术形式往往蕴含着印象、幻觉、直觉、通感和本能冲动等主观感情因素，可以直接通向审美现代性。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卡林内斯库用隐喻性的表述来指称现代性艺术的审美表现，把现代主义、先锋主义、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称为“审美的现代性”的五种面孔。中国学者则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经验出

^① 姚文放：《文学传统与现代性》，载《学术月刊》2001 年第 2 期；周宪：《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载《文学评论》2002 年第 5 期。



发,认为属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颜面是革命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先锋主义、拿来主义等,甚至“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也可列入。^①从现代美学的发展来看,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或世俗现代性有纠偏和修正功能,它不仅指审美活动的自由性和非功利性,也包括美的批判性和美感的超越性。如康德强调审美判断是只涉及对象形式的主观的合目的性的感情愉悦,即“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②,他对“自由美”和审美“无功利性”的论述,奠定了现代艺术审美体验的核心理念。

作为现代美学的开启者,康德把美学界定为研究人类情感及其表现形式的科学,使重视感性形式的现代美学与资本主义社会重功利的现代理性产生对峙,以至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的对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的对峙,源于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是建立在将人性视为由理性/感性二元结构所组成的理论预设之上的。故康德把审美置于科学认识与道德实践之间,以为艺术的感性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里是初步或低级的,最终要皈依人的道德意志即实践理性。而这正是尼采不满意康德的地方,他认为美在生命,唉,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美。他说:“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③尼采放弃了从认识论的角度谈论艺术的审美价值,转而从生命本能的需求来说明艺术和美的存在意义,以为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或白日梦,悲剧是神思醉酡的生命之舞,人生的意义存在于日神式的对外在世界的梦幻观照和酒神式的内在激情体验里。

这种生命美学(或曰存在美学)是超越世俗的,“超人”有一种于痛苦中体验生命快乐的太人性的美,可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异化的工具的理性的批判,具有拒绝平庸的世俗救赎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式的超人能使我们反思现代人的处境和生存状态,审美作为人类一种自由的生存方式,在肯定个体现世生命活动的同时,以其形而上的超越性体验到存在的真理。他最推崇的一

① 王一川:《现代性的颜面》,载《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

②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6页。

③ 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22页。



句诗是：“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①人是具有自己生存方式的存在物，“居住”即存在，“诗意”是一种美感，一种引导我们超越世俗而回归自己精神家园的生存体验。在“诗”与“思”的论说中，海德格尔强调“诗”绝非一个文化品种，而是一种聆听命运之声时的生命存在感受，它能消除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疏离。现代世界的根本危机在于使人远离了自己诗意的生存根基，造成世俗社会人性的沉沦。人作为在大地上能言说的存在物，其“说”和“思”都是“此在”对于“存在”的独特感悟和体会，是一种心灵的响应和情感的共鸣，所以都具有“诗”的意味。世界建基于大地，而大地要通过世界展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物之存在的意义展示，是一个不断“去蔽”、“澄明”的过程，诗与思是意义的发现，是存在的澄明和美的体验，而工业社会的世俗现代化却使这种“诗意”日渐稀薄，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源自西方的审美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思想上的影响可举尼采为例，由于尼采在西方现代美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又能用艺术表现科学，以文学讲解哲学，他的思想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较其他西哲要大得多，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田汉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都曾为尼采的超人哲学所吸引，又都撰文介绍过尼采，而且是把他当作文学家介绍的。如鲁迅在谈其《狂人日记》的写作时，特意引尼采的超人言论作说明，以为狂人虽有睥睨虫豸的气概，可其忧愤之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②。但审美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思想话语，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和审美理想，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在于使其优秀作品具有超越世俗的美感和诗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年普遍存在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叙事模式，将对恋爱自由的憧憬与革命斗争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表达的是作家对政治与性爱的一种浪漫的理解，其带有小资情调的爱情描写，其实只是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超现实的审美乌托邦。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里表达一种乡土中国的情感记忆，其中带有生活气息而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景色

^①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②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描写,是一种桃花源式的审美乌托邦。即使是城市文学,也要在时髦、刺激的都市生活的浮世绘里,写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下面有素朴的温馨感受,何况还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小城故事。美作为自由的象征,审美作为人生在世的精神存在方式,往往带有若干理想化的成分。所以,当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对文学的诗性语言进行世俗性的解构,对文学经典的美感加以“祛魅”之后,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也就面临着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的严峻考验了。

三

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后,文学和文论研究遭遇了提前到来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强烈冲击。面对文学生成方式的商业运作、文学消费的大众化与时尚化,以及图像文本和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感知与表达方式的颠覆等一系列当下的文化问题,文学研究或文艺理论除了坚持追求人生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伟大传统外,是否还可以从后经典叙事学和后结构主义的“互文”分析里获得解决问题的另类思路呢?

注重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现代性在中国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可我们的一只脚已踏进了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时代,文学和文论研究被无形的手纳入了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体制里。当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在追求现代化时,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似乎已悄然兴起。以满足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一种大众化、世俗化的文化生产体制开始形成,它强调的是票房价值,遵循一种高效率的以机械性复制为生产手段的商业运作模式。这种大众文化是一种标准化的文化工业,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所言,它按照既定的程序和统一的标准,大规模地批量生产毫无个性的文化复制品,极大地扼杀了作者的艺术个性和创造力,同时也瓦解了接受者的批判能力和审美素质,使消费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受人摆布、消极被动的文化个体。^①虽然文化工业的生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艺创作的物质条件,提高了作家文字生产的效率,实现了文学作品的大批量

^① 参阅(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陆杨、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24页、第263~266页。



生产(每年仅长篇小说就有上千部),但也使以往作家倾其毕生心血创作精品的意识荡然无存,原本是独一无二的精神创造变成了模式化的复制生产,独特的人生感受和审美把握变成了简单的模拟和仿制。这并不费力,投入小而获利大,而且比较容易赢得读者或观众。

消费时代的读者,或者说文学的消费者,也放弃了心领神会的阅读欲望和精神净化的审美诉求,而只追求感性愉悦和无厘头的搞笑。与后现代社会将关注的重心由生产转移到消费一样,读者而非作者才是消费时代文学的主宰者,他们厌倦了对文学创作者的仰视姿态,在文化消费中成为文学的真正的上帝。在大众消费文化品的生产过程中,作家不得不屈从于大众的审美口味,他们关心的不再是创作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弃了文化的启蒙立场,开始机警地揣摩文学消费者的阅读需求。媚俗成为消费时代文学创作者聪明的生存选择,精明的商家则在产品策划、包装、炒作上大做文章,不断培养或刺激消费者的欲望和热情,形成新的文学消费的增长点。文学作品的精神价值和艺术质量已不再重要,即使是内容苍白、艺术拙劣的作品,通过标签化的宣传、符号化的渲染和话题性的炒作,也可以一炮走红,造成轰动性的市场效应和广泛的社会显示度。

很少有人对文学价值的失落和文化理性的沦丧表示担忧,因后现代社会里的消费品多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它的生产和消费依赖于符号所赋予的品牌形象,不再以自身的实际使用价值作为存在基础。在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的话语里,文学的市场策划、包装和炒作等商业运作手段之所以举足轻重,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学也视为一种文化消费品,注重品牌(或明星)效应的可复制的文化生产模式,为快餐式的文学产品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支持,促进了文学消费的大众化和时尚化。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五四”白话文所表现出的大众品味,到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和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学,再到 90 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面向当下生活,“大众化”一直是个重要的文学话题。但在后现代的消费时代,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动机已不再是革命和政治,“大众文学”的“大众”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而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文化素养和休闲时间的社会中层人士,以



都市白领和大中院校里的学生为代表。他们是当今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的消费主体,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属于一种“小众”存在,却引领着全民的消费欲望和想象,并直接导致了大众文化消费的时尚化倾向。

在各种商品大量过剩的消费时代,“大众”所注重的已经不再是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而是作为某种身份、地位和声望之符号象征的商品名牌,形成一种追求时尚而带有炫耀成分的消费观念。^①与使用价值的相对稳定相比,商品的符号性消费是一次性的,品牌符号的花样翻新催生了时尚的变幻莫测,引领时尚的消费者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购买中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品位。当文学被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时,情况也很相似,作家也都趋向于明星化,文学作品的热销取决于读者变化着的口味,取决于商家的包装理念和媒体的炒作力度,而不是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那些带有小资情调的城市文学,那些可称为心灵鸡汤的流行文学作品,成为都市白领时尚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教科书,单一的时尚题材和暧昧的话语,使其失去了涤荡灵魂和震撼心灵的力量,成为彻头彻尾的休闲读物。文学沦为休闲读物后,读者的阅读成为典型的一次性文化消费行为,以致一批又一批的作家作品一夜走红,而又转瞬即逝。跟踪时尚和寻找卖点,大批量的复制生产,畅销后被迅速遗忘,正在成为消费时代通俗文学特有的存在方式。

在后现代社会里,传统的纸质文字媒介已经无法满足符号化、大众化、时尚化的文化消费需求,电子传媒成为消费文化的新宠。由视觉表象构成的图像文本与后现代价值取向和消费主义交织互渗,成为一种去中心、去深度、填平鸿沟的文化“解构”方式,消解着传统文学经典的存在意义和审美价值。与文字媒介相比,动态的图像更具体、更直接、更快捷地作用于人的视觉,更具感观刺激和形象性,更能给人以快感。但是,一切图像都是预先制作好的,一切读图行为也都要受编导者的指引,这使读图从根本上失却了文字阅读所需要的自由的审美想象力和直觉洞察力,读者或观众往往为虚拟的图像编排所误导。但图像文本依托于电子传媒,以快

^① 马大康:《从“鉴赏”到“消费”——消费文化与文艺学研究范式变革》,载《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管宁:《当前中国文学的时尚化倾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